

第一章 全球化

我的一个朋友对中非农村生活进行研究。几年前，她第一次去了那个遥远偏僻的地方，在那里进行她的田野调查。在她到达的那一天，她被邀请去参加当地一个家庭的晚上招待和娱乐活动。她期待着发现这个偏远社区的传统娱乐方式。然而，其情形就如完全是在看录像《本能》（Basic Instinct）一样。而在那个时候，这部电影甚至还没有在伦敦电影院放映。

这样的小插曲揭示了我们这个世界的一些东西。而且它们所揭示的并不是微不足道的。这不仅仅是人们在他们现存的生活方式中增加了现代工具的问题，如录像、电视、个人电脑等等。我们生活在转型变迁的世界中，我们所做的每一方面几乎都受到了影响。无论好坏与否，我们正在迈入一种全球秩序中，尽管没有人完全理解，但是它对我们所有人都在产生影响。

全球化可能不是一个特别具有吸引力或者华丽的辞藻。但是，世纪末的任何一个想要理解我们将来的人绝对不能忽视它。我去过国外许多地方演讲。最近我所去的国家没有一个不是在热烈讨论全球化问题的。在法国，这个词就是 *mondialisation*。在西班牙和拉丁美洲，这个词是 *Globalizacion*。德国人却念作 *Globalisierung*。

这个术语的全球传播就充分表明了这个词所指的发展的含义。每一个商业领袖都谈论它。没有一次政治演讲是完全不涉及它的。然而，即使在 20 世纪 80 年代晚期，这个词在学术界或日常语言中被普遍使用，因为它已经无处不在了。

我们不能因为这个词突然出现的普遍性而对全球化观念的意义总是不清楚而感到吃惊，或者对学

术界已经开始反对它而感到诧异。全球化与我们现在都生活在同一个地球上这样一个主题有关系，但是，它们之间的关系确切地说体现在哪些方面，而且这种观念真的有效吗？在过去几年出现的有关全球化的争论中，不同的思想家持几乎完全相反的观点。有些人对整个事情持怀疑态度。我称他们是怀疑论者。

怀疑论者认为，所有关于全球化的讨论只是一种谈论而已。无论它有什么好处，无论它进行什么试验也不管它产生什么忧患，全球经济并不会与以前存在的经济有什么特别的不同。这个世界仍然像多年来一样地运转。

怀疑论者认为，大多数国家从对外贸易中只获得很小的收益。而且，大量的经济贸易都是在地区之间进行，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全世界范围内。例如，欧盟国家主要在他们自己中间进行贸易。其他主要的贸易区，如亚太贸易区或者北美贸易区，情形也是如此。

另外有些人持完全不同的观点。我把他们称为激进分子。激进分子认为，不仅全球化是非常真实的，而且它产生的结果也可以被每一个角落感受到。他们认为，全球市场比 20 世纪 60 年代和 70 年代有

了大得多的发展，而且不受制于国家边界的影响了。国家已经失去了他们曾经拥有的大部分主权，而政治家已经失去了他们影响事件的大部分能力。再也没有人尊敬政治领导人或者再也没有人对政治领导人所说的那些东西有太大的兴趣，这并不令人吃惊。民族国家的时代结束了。正如日本商业作家 Kenichi Ohmae 所说的，国家已经变成了“虚构的小说”。像 Ohmae 这样的作家们将 1998 年亚洲危机所遇到的经济困难看做是证实了全球化的真实性，虽然这是从其负面来观察的。

怀疑论者倾向于站在政治左翼一边，尤其是老左翼一边。因为如果这一切实质上是荒唐的，那么，政府仍然能够控制经济生活，而福利国家也仍将完整无缺。怀疑论者认为，全球化这个观念只是那些希望拆除福利体制、减少国家开支的自由市场主义者所散布的一种意识形态。现在所发生的一切充其量只是退回到了一个多世纪前的世界。19 世纪晚期已经有一个开放的全球经济，那时有着大量的贸易，包括货币贸易。

那么，在这场争论中，谁是对的？我认为，激进派是对的。今天世界贸易的水平比以前任何时候都要高得多，而且涉及的商品和服务范围也要广得多。

但是，最大的差异在于金融和资本流动水平。现在的货币已经发展为电子货币（这种货币只表现为计算机中的数字），这使得以前的世界经济无法与当前相比。

在新的全球电子经济中，基金管理者、银行、公司以及成千上万的个人投资者们只要轻轻点击鼠标，他们都能将大量的资本从世界的一端传递到另一端。他们这样做时，他们就能够动摇似乎坚如磐石的经济，亚洲金融危机就是这样发生的。

世界金融贸易量通常是以美元来计算的。100 万美元对大部分人来说是一笔巨资。如果以 1 叠 100 美元的钞票来测量，100 万美元就是 8 英寸高。10 亿美元，换句话说也就是 1000 个百万美元，叠起来的话将比圣保罗教堂还要高。1 万亿美元，也就是 100 万个 100 万美元，将超过 120 英里高，比珠穆朗玛峰还要高 20 倍。

然而，现在，每天全球货币市场的营业额远不止 1 万亿美元。从 20 世纪 80 年代晚期开始，这种营业额就有了大规模增加，更不用说更遥远的过去了。无论我们口袋里或者银行账户中是哪一种货币，其价值都根据货币市场的波动而不断地发生变化。

因此，我会毫不犹豫地说，正如我们经历的那

样，全球化在许多方面不仅是新的，而且是革命性的。然而，我并不认为，怀疑论者或者激进分子已经正确地理解了什么是全球化或者全球化对我们来说意味着什么。他们几乎都只从经济学角度来看待全球化这一现象。这是一个错误。全球化是政治的、技术的、文化的以及经济的全球化。全球化首先受到通讯系统发展的影响，通讯系统的发展只可以追溯到 20 世纪 60 年代晚期。

在 19 世纪中期，一位马萨诸塞人像画家塞缪尔·摩尔斯(Samuel Morse) 第一个通过电报将“上帝做了什么？”这个信息传递出去。同时，他开创了世界史的新阶段。以前从来没有一个信息不需要人带着它才能够被传递出去的。然而，卫星通讯的出现标志着对过去的巨大突破。第一颗商业卫星只是在 1969 年发射的。现在，已经有 200 多颗那样的卫星发射到天空，每一颗都承载了大量信息。即时通讯第一次从世界的这一端传递到另一端成为了可能。在过去的几年中，越来越多地与卫星发射结合起来的其他类型的电子通讯也加速发展。直到 20 世纪 50 年代晚期才出现了专门的跨越大西洋或者太平洋的电缆。第一条这样的电缆所承载的声音线路不超过 100 条，而今天的却能承载 100 多万条。

在 1999 年 2 月 1 日，也就是在摩尔斯发明他的电码系统之后的 150 年，摩尔斯电码最终从世界舞台上消失了。作为一种海洋通讯手段，它被终止使用了。取代它的是使用卫星技术的通讯系统，借着这种通讯系统，遇难中的船只能够立刻被查明。不久前，大多数国家都准备好了这种转变。例如，1997 年，法国在他们的地区水域中停止使用摩尔斯代码，随着法国的繁荣，他们停止使用这种代码：“通知所有的人。这是我们永久的沉默之前的最后一声呐喊。”

即时电子通讯不仅仅是新闻或信息传递的更快捷方式。它的存在改变了我们的生活结构，无论对富的还是穷的都是一样。当纳尔逊·曼德拉(Nelson Mandela)的形象比我们邻居的长相对我们来说还更为熟悉的时候，我们日常经历的性质就已经发生了某种变化。

曼德拉是一个全球知名人物，而其知名度在很大程度上都是新通讯技术的产物。随着每一次革新浪潮的出现，媒体技术的延伸不断增长。美国的半导体花了 40 年的时间获得了 5000 万的听众。在引入个人电脑 15 年之后，个人电脑就有了相同数量的用户。在个人电脑被使用之后，5000 万美国人只需

要花 4 年的时间就均能使用因特网。

把全球化看作与庞大体系如世界金融秩序联系在一起是错误的。全球化不仅是指什么是“在那以外”、什么是遥远偏僻以及什么是远离个人的。它也是一种“在其中”的现象，影响着我们生活中的亲密的个人方面。例如，正在许多国家进行的关于家庭价值的争论似乎可能从全球化的影响中消除出去。其实并不如此。尤其是当妇女要求更大的平等时，世界许多地方的传统家庭系统正在发生变化或者受到影响。只要我们从历史纪录中就能够知道，以前从来没有这样一个社会，妇女取得了与男人接近的平等地位。这是日常生活真正的全球性革命，从工作到政治领域，全世界都能感受到它产生的结果。

因此，全球化是一系列复杂的过程，而不是一个单独的过程。而且这些过程是以一种矛盾的或者相反的方式运作的。大多数人将全球化看作是地方社区和国家对全球的“推进”力量或者影响。这的确是它带来的后果之一。国家的确失去了他们曾经拥有的某些经济力量。然而，它也产生了一种完全相反的结论。全球化不仅产生向上的拉力，而且也产生向下的推力，给地方独立带来了新的压力。美国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很好地描述了这一

点。他认为，国家不仅变得太小以至于无法解决大问题，而且也变得太大以至于无法解决小问题。

全球化是世界上不同地方的地方文化认同的复兴的理由。例如，如果有人问为什么苏格兰人想要在英国获得更多的独立，或者为什么魁北克会发生强烈的分裂主义运动，只从他们的文化历史中是找不到答案的。随着更古老的民族国家的力量减弱，地方民族主义也应全球化倾向而出现了。

全球化产生了国家范围内和国家之间的新的经济和文化区。香港经济区、意大利北部地区和加利福尼亚的硅谷都是这样的例子。巴塞罗那区也是这样。西班牙北部的巴塞罗那周围的地区延伸到了法国。巴塞罗那所处的加泰罗尼亚地区与欧盟紧密结合在一起。巴塞罗那是西班牙的一部分，然而看起来也是向外联系和发展的。

这些变化是由许多因素推动产生的，一些是结构性的，另一些是更具体的和历史的因素。经济影响尤其是全球金融系统当然是其中的推动力。然而，它们与自然力量不同。它们受到技术、文化传播以及政府解放并对其国家经济解除管制的决定等的影响。

苏联的解体更进一步加深了这些发展的作用，

因为再也没有一个重要的国家集团处在全球化范围的外面了。它的解体并不是偶然发生的。全球化解释了苏联为什么会以及如何走向它的终结的。前苏联和东欧国家在增长率方面是直到 20 世纪 70 年代早期才可与西方相比较的。苏联解体以后，他们很快落在了后面。由于苏联共产党对国营企业和重工业过分重视，他们无法在全球电子经济中竞争。

苏联和东欧政权无法阻止人们对西方广播和电视的接收。电视在 1989 年革命中起着直接的作用，这次革命被人们恰当地称为第一次“电视革命”。发生在一个国家的街头抗议被其他国家的电视观众所观看，然后他们自己也会走上街头。

当然，全球化并不以公平的方式发展，而且它所带来的结果绝对不是完全良性的。对许多生活在欧洲和北美洲以外的人来说，全球化似乎就是西化或者美国化，因为美国现在是惟一的超级大国，在全球秩序中占据主导的经济、文化和军事位置。在全球化的最显而易见的文化体现中，许多都是美国的，如，可口可乐、麦当劳和美国有线新闻等。

大部分大型跨国公司也都建立在美国。这些公司并不都来自富国，也不是来自世界上较穷的地区。对全球化持乐观态度的人主要将这看作是工业化北

半球(industrial North)的事,在这里,南部的发展中国家不起什么作用或者根本不起任何作用。这可以看作是破坏了地区文化、扩大了世界不平等并且恶化了许多穷困地区的状况。有些人认为,全球化创造了许多胜者和败者,有些人暴富了起来,而大多数人陷入了悲惨绝望的生活中。

的确,统计数字令人非常沮丧。从 1989 年至 1998 年之间,全世界最穷的 $\frac{1}{5}$ 的人口占全球收入的份额已经从 2.3%下降到 1.4%。另一方面,最富的 $\frac{1}{5}$ 人口所占的比例却上升了。在撒哈拉南部非洲,20 个国家人均收入比 20 世纪 70 年代晚期还要低。在许多欠发达国家,安全设备和环境规则很少或者几乎就不存在。一些跨国公司在那里销售在工业国家中被控制或者被禁止销售的商品,如劣质药品、破坏性的杀虫剂和焦油及尼古丁含量高的香烟等。人们可能会说,这不是一个地球村,而更像是全球掠夺。

不断扩大的不平等加上与之相关的生态环境危险是全世界社会面临的最严重的问题。然而,这不能只归罪于富人。我基本上认为,今天的全球化只是一定程度上的西化。与较穷的国家相比较,西方国家以及更笼统地说的工业国家当然仍然对全世界

事务产生的影响要大得多。但是，全球化正变得越来越无中心化，不受任何国家集团的控制，也很少受大公司的控制。全球化所带来的影响在西方国家和在其他地方感觉差不多。

对于影响政府本身性质的全球金融系统及社会变迁来说，情况的确如此。所谓的“反殖民化”正变得越来越普遍。反殖民化意味着非西方国家对西方的发展产生影响。这样的例子非常多，如洛杉矶的拉丁化、印度的全球取向的高技术区的出现以及巴西电视节目卖给葡萄牙等。

全球化是一种促进普通商品的力量吗？考虑到这个现象的复杂性，这个问题不能简单地来回答。问这个问题的人以及认为全球化导致世界不平等不断加深的人通常是从经济全球化以及自由贸易的角度来考虑的。现在，自由贸易明显不是一种纯粹的利益。当它涉及欠发达国家时尤其如此。一个国家或者某些地区开放进行自由贸易会削弱当地的生存经济。一个只依靠少数产品在世界市场上销售的地区非常容易受到价格变动以及技术变革的冲击。

贸易总是需要一套制度框架，其他形式的经济发展也是如此。市场不能只依靠纯粹的经济手段来建立，某种经济到底在多大程度上向世界市场开放

必定取决于许多标准。然而，反对经济全球化而选择经济保护主义对于富裕国家和穷困国家来说同样都是一个错误的策略。保护主义在某些时候和在某些国家可能是一种必需的策略。例如，我认为，马来西亚在 1998 年引入控制手段阻止资金大量外流就是正确的。但是，长期的保护主义形式将无助于贫穷国家的发展，而对于发达国家来说，将产生敌对的贸易集团。

关于我一开始提到的全球化的争论已经主要集中在全球化对民族国家的含义上面。民族国家以及国家政治领导人仍然非常强大吗？或者他们在很大程度上是否逐渐变得与塑造这个世界的力量毫无关系呢？民族国家的确仍然非常强大而且政治领导人在世界上也起着重要作用。然而同时，我们可以看见，民族国家正在被重塑。民族经济政策不再像以前那样有效了。更重要的是，这些国家不得不重新思考他们的认同，现在，旧有的地缘政治学正逐渐过时。我认为，尽管这个观点还存在争议，但是，随着冷战的消融，大部分国家不再有敌人了。谁是英国、法国或者巴西的敌人呢？科索沃战争并不是国家与国家之间的斗争。它是旧形式的地方民族主义与受伦理驱动的新干涉主义之间的冲突。

今天，国家面临的是风险和危险，而不是敌人，这二者在性质上发生了巨大的转变。这样的观点不仅仅能够用来评论国家。在每一个地方，我们能够看见，许多制度从外表看与过去完全相同而且有着相同的名字，但是其实质内容却完全不同。我们继续谈论国家、家庭、工作、传统和自然，就好像它们与过去完全一样。然而，实际上并不是这样。外表还在，但实质内容已经发生了变化，这不但发生在美国、英国或者法国，而且几乎每一个地方都是如此。它们就是我所称的“外壳制度”（*shell institutions*）。它们是一些已经变得不能充分完成它们被要求执行的任务的制度。

正如我在这章中所描述的变化和变迁起着越来越大的作用一样，它们正在产生一种以前从未存在过的东西，即一个全球的世界性社会。我们是生活在这个社会中的第一代，现在我们只能模糊地看清它的轮廓。无论我们在什么地方，它正在动摇我们现存的生活方式。至少在目前，这个世界性社会不是由集体的人类意志所推动产生的全球秩序。相反，它正以一种不固定的偶然的方式出现，同时带来一系列影响。

这个世界性社会不是固定安全的，而是充满了

焦虑，并被深深的分化所影响。我们中许多人都感受到许多我们无法控制的力量的控制。我们还能够将我们的意志强加于它们吗？我认为，我们可以。我们所体验到的那种无能为力并不是个人失败的标志，而是反映出我们的制度无能为力。我们需要重构我们曾经有过的这些制度，或者建立全新的制度。全球化并不是我们今天生活的附属物。它是我们生活环境的转变。它是我们现在的生活方式。

第二章 风 险

1998 年 7 月可能是世界历史上最热的一个月。而作为一年,1998 年可能是最热的一年。热浪浩劫肆虐了北半球的许多地方。例如,在以色列的埃拉特,温度几乎高达 46 摄氏度,同时,这个国家的水消费上升了 40%。美国德克萨斯州的温度还远不止这么高。这一年的头 8 个月,每一个月的温度都刷新了同期的纪录。然而,就在这之后不久,在那些受热浪影响的许多地方中,有些以前从未见过雪的地

方又下了大雪。

像这样的温度变化是人类干预世界气候的结果吗？我们不敢肯定。但是，加上近年来飓风、台风和风暴不断增加，我们不得不承认这种可能性。作为全球工业发展的结果，我们可能改变了世界的气候，还大大破坏了地球的生存环境。我们不知道进一步的改变将带来什么结果，我们也不知道它们将带来什么危险。

我们认为，它们都与风险联系在一起。我们可以通过风险这个概念来弄清这些问题。我希望说服你，使你相信，这个显然非常简单的概念却能说明我们生活其中的这个世界的一些最基本的特征。

与以前的时代相比较，乍一看，风险这个概念似乎可能与我们现在的时代没有任何具体的关系。难道人们不是总需要面对他们受到的直接风险吗？欧洲中世纪的大多数人的生活都非常糟糕而且寿命很短，就像现在这个世界上较穷困地区的许多人的生活那样。

但是，在这里，我们遇到了一些真正令人感兴趣的東西。在中世纪，除了一些与风险相关的概念外，没有任何真正的风险概念。就我能够发现的而言，在大多数其他传统文化中也没有风险这个概念。在